

中 国 文 学 论 丛



巴金创作综论

■ 辜也平 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论丛

巴金创作综论

辜也平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论丛

巴金创作论

辜也平 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公安厅蓝盾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东浦路 121 号 邮编: 350013)

*

850×1168 32 开本 13.25 印张 320 千字 4 插页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34—2582—0/I·159 定价: 30.5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李存光

在1997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欣喜地读到又一部研究巴金的专著，这就是福建师范大学辜也平副教授著的《巴金创作综论》。北国已是冰封雪盖的严冬，在斗室中翻阅书稿的我，却因读到这部有特色、有新意的著作而觉得春风拂面。因而，我愿围绕也平的著作，写下些许看法和感想。

我的话要先从80年代说起。那一时期，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巴金研究是卓有建树的领域之一。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概括说来，80年代的巴金研究有三个突出的表现：完成了基本资料的搜集、发掘和系统整理，形成了一支锐意进取的较稳定的研究队伍，涌现了一批坚实有力的学术著作。这三个方面，是巴金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确立并趋于成熟的基本标志。进入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略显沉寂，但巴金是其中既活跃又富于活力的领域之一。一些认真的学者，无论是年青人还是年迈者，也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立足不同的地域和岗位，身居相异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依旧孜孜矻矻地探索着，兢兢业业地耕耘着，并不断奉献出自己收获的成果。在这样的努力下，90年代8年间，巴金研究又有了新的面貌。

首先，资料的搜集和发掘有所突破。其中，值得特别说起的有三项：一是1994年出齐的26卷本《巴金全集》和最近一次推出的10卷本《巴金译文全集》，使研究者具备了系统可靠的基本

材料，尤其是巴金集外佚文的汇集，现存日记、书信的披露，和近 50 年来未曾再印行过的译文的重印，更具珍贵价值；二是日本学者山口守遍访欧美，发掘出 20 年代至 50 年代巴金与西欧无政府主义人士的往还书信，以及我国世界语学者许善述先生汇编的巴金与世界语关系的专书，填补了若干史实的空白；三是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先生、侄子李致同志的回忆文章汇集出版，为人们了解巴金的为人为文增添了活的史料。

其次，研究队伍在更迭中仍有实力。年长的研究者如陈丹晨、张慧珠、徐开垒等，继续献出厚重的新著；中年研究者如陈思和、宋曰家、汪应果、唐金海、孙郁、张民权等，不断有力作问世；新进的中青年研究者如肖明翰、李兴民、周立民、刘福泉等，显露出勃勃的生机。

再次，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期间，除出版了 4 部各具特色的传记和作为两次学术研讨会论文总汇的 2 本论文集，以及第一部外国学者用中文写作、在中国出版的个人论集外，其它著作，都是关于某一专题的研究，如全面论述巴金的美学思想、巴金与中外文化关系、巴金与福克纳家庭小说比较，巴金的人格与艺术精神、巴金的语言艺术，以及深入解析巴金主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随想录》的重要篇章等。这些著作展示出 90 年代研究的思维空间有所拓展，研究意向趋于多元，研究方法和表述话语更为多样。

我之所以不嫌冗赘概述这些情况，是想说明本书著者辜也平立足的“土地”及其“周边环境”，因为也平就是一位活跃在八九十年代巴金研究领域并引人注目的学者，一位谙熟研究状况并力求有所前进和突破的辛勤耕耘者。

也平对巴金的研究始于 80 年代初，他为 1985 年在成都举行的“四老”学术研讨会提供的关于《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

异同的论文，就令同行刮目相看。此后，我不断读到他清新质朴而又不乏创见的研究论文。1995 年秋，也平得到在北京大学师从严家炎教授研究的机会，在京一年，他住城之西北方，我居城之东北角，引领相望，见面不易。他告诉我，要撰写一部专著，作为自己十余年巴金研究的总结和交待。按照他当时的构想，这部专著分为三个编次：“上编”系创作主体研究，涉及巴金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人格精神、文艺观等；“中编”系文本研究，论述巴金各时期的重要作品；“下编”系接受研究，考察国内不同时期读者和海外读者接受巴金作品的状况，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巴金的研究状况等。也平的宏阔思路令我赞赏，我希望他排除干扰，尽早完稿。

现在，也平积十余年研究功底和近二年心力铸就的书稿，像一座建筑，实实在在地摆在我眼前了。不同的是，我面前的这座建筑与设计蓝图相比，在框架结构上有所调整，规模也大大压缩了。原设计中的“上编”，在这里只有一章，“下编”则分散到导论、余论及附录中，“中篇”现有 10 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主体。读了书稿，我并没有为也平的原构思未能全部实现而产生大的遗憾。由于也平写成的著作，把文本研究作为重点放到了中心的地位，这样，他通过分析、研究巴金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以达到认识、理解和把握巴金总体的意图，得到了很好的实现，这部著作也因以文本精读为特色，在 90 年代出版的众多专著中，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一席。

也平强调文学家巴金是整个巴金研究的根本，认真研读作品是根本上把握巴金的关键。我赞成他的意见。没有了作品，也就没有了文学家；没有了文学家巴金，也就没有了人们从多方面推崇成贬抑的“巴金”。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当然首先要认真地、反复地阅读、理解作品，这是一切研究

的根基。但是，研究者在表达思想、撰写著作时，却不一定都要以作品论为题，也不一定只采用作品论的方式传达自己对作品的认识与体味。完全围绕作品进行论述，是作品研究最直接、最主要的方式，但并非唯一的方式。因此，将所有不以作品研究命题的著作，都看作“非文学倾向”，就未必公允、未必妥当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也平的看法小有分歧，不知也平以为如何？

也平的这部著作。作的是作品研究工作，他取得了成功。在他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以为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其一是在宏观指导下微观，微中见著。也平对于巴金的生活、创作和思想历程，人格精神，文学观及作品的风格特征等，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对巴金的总体有比较准确的宏观把握。他所作的大篇幅的文本研究，不是孤立的单篇解读，也不是印象式的泛泛议论。他细心地挖掘每部作品自身的丰厚内涵，同时，又将作品置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学环境中进行梳理，置于巴金创作和思想的历程中加以品辨，因此，阐发意蕴，揭橥精义，分析特质，考究得失，均视野开阔，得心应手。举例来说，书中对《爱情的三部曲》无意识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抒写挽歌、自觉地为读者建构一种理想的英雄人格的分析，对巴金 17 年散文创作从“我”的抒怀到“我们”的合唱的解说，便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精彩篇章。

其二是多种研究方法的兼蓄并收。巴金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极强的作家，一位毕生和时代、和人民紧紧相连的作家，离开时代和社会现实生活，不可能真正理解巴金。也平在研究巴金作品的时候，不仅自觉坚持和发扬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优势，还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广采多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加以运用。比如，从心理学角度探讨《灭亡》写作动机和巴金创作风格的成因与转换，用叙事学理论解析《家》、《春》、

《秋》以及反映朝鲜战地生活小说的表现技巧，用系统论方法探究觉新的复杂心态，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寒夜》中的人物形象，通过“异文”考究，比较《家》的版本流变，以及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的异同……。这一切，有助于更切贴、深入地感受、品辨、探寻作品的丰富内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平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有点像巴老创作时那样，抓得到手、用得上的武器都派上用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达到变换研究视角、拓展研究话语空间的目的。”也平的良苦用心和认真探索，无疑是值得赞许的。

如果说我读了这部著作后犹感不足，那就是也平原构思中的接受研究部分，在书中虽有涉及，但未充分展开。我以为接受研究是巴金作品研究乃至整个巴金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巴金的作品影响过几代人，巴金一直视读者为自己的动力和生命。且不说对巴金作品的接受研究应有专著论述，即便以《家》、《随想录》这样影响广泛深远的单部作品为题，撰写专著专书，也当是应该的和可能的。不知也平是否可以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也平的著作开印在即，我因碌碌之事纠缠身心，缺乏从容思考和执笔的时间，只好拉拉杂杂写下以上的话，权且充作序言。

新的一年逼近了。我视远在南国的也平：更上层楼！

1997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李存光 (1)
导 论 关于巴金与巴金研究	(1)
一 巴金研究, 一个永恒的话题	(1)
二 巴金研究的历史考察	(5)
三 巴金研究现状的思考	(12)
第一章 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	(18)
一 从探索人生到反思历史的创作道路	(18)
二 漫长而曲折的思想历程	(26)
三 独具崇高魅力的人格精神	(45)
四 维系着社会与人生的文学观	(55)
第二章 ^{15.12} 《灭亡》: 精神漂泊者的灵魂独白	(67)
一 创作的动机与心态	(69)
二 心灵的表白与苦闷的流露	(76)
三 广采博取中的文学尝试	(81)
第三章 《爱情的三部曲》: 挽歌中的神话	(88)
一 一曲深情的挽歌	(89)
二 建构理想英雄的人格神话	(98)
三 从描写爱情故事到讲述英雄传奇	(109)
第四章 《家》: 冲击旧制度的生活的激流	(121)
一 “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	(123)

二	“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	(132)
三	具有民族特色的叙事方式与技巧	(142)
四	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	(152)
第五章	《春》与《秋》：并未随激流奔向社会	(175)
一	讲完封建旧家庭的衰亡故事	(176)
二	高觉新，一个孤独的守墓人	(188)
三	《红楼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202)
第六章	《火》：“一本宣传的东西”	(223)
二	抵抗、流亡、寻找栖息的家园	(223)
二	初露端倪的创作转向	(229)
第七章	《憩园》：转向后的新探索	(237)
一	是子弟败家还是家败子弟	(238)
二	透视两难女性的苦闷心灵	(242)
三	匠心独运的叙事策略	(245)
第八章	《寒夜》：黎明前的呻吟与呼号	(249)
一	自觉的现实批判指向	(249)
二	传统叙事母题的现代语义	(253)
三	娴熟的现实主义技巧	(265)
第九章	十七年的创作：新时代的颂歌	(277)
一	一个真诚的“歌德派”	(277)
二	从“我”的抒怀到“我们”的合唱	(286)
三	开掘新人形象的理想人格	(297)
第十章	《随想录》：文学老人的沉思	(308)
一	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	(309)
二	深刻而严厉的自省与自责	(316)
三	寻回属于“自我”的艺术世界	(321)
余 论	创作风格及其它	(332)

一	巴金创作风格的基本特征	(332)
二	制约风格形成的几个重要因素	(339)
三	时尚与心境作用下的风格转换	(349)
附 录		(361)
一	走向世界的巴金	(361)
二	巴金文学作品小辞典	(372)
三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403)
后 记		(407)

导论 关于巴金与巴金研究

一 巴金研究，一个永恒的话题

巴金出生于本世纪初，他的生命历程几乎跨越了整个 20 世纪。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①，为着人类的幸福，曾经用自己的青春与热情进行过不懈的探索，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巴金奔走过，呼唤过。1949 年之后，他为新生的祖国吟唱过热情的颂歌，也亲历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总之，从世纪初县太爷升堂威严下的荒诞，到世纪末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惶惑，巴金都有过深切的体验。他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亲历者，是 20 世纪“伟大的见证人”^②。

在数十年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巴金为读者提供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从 20 年代初表同情于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诗章到 80 年代痛定思痛的“随想”，巴金的创作完整地融进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全过程。这期间，他有过 20 年代的探索，30 年代的呼号；有过 40 年代的揭露与批判，五六十年代的歌功与颂德；也有 80 年代

①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巴金全集》第 16 卷第 66 页。

② 法国总统在为巴金授勋仪式上的讲话。转引自《巴金研究在国外》第 32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 10 月版。

的反思与“再思”。巴金的文学创作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带有个性色彩的微缩文学史。

巴金的作品哺育了数代的青年读者。早年，他的《灭亡》、《家》等小说激励过许多青年冲出旧家庭，走入广大社会；直至晚年，也还有“寻找理想的孩子”向他呼救，寻求他的“帮助”与“指点”^①。在40年代，曾有大学教授问自己的学生们“最喜欢读什么书”，他们的答复常常是两个名字：鲁迅和巴金。于是这位教授颇为感慨地认为：“这两位作家无疑地是一九四四年青年的导师。让我看来，巴金对学生们的影响好像比鲁迅先生的更大一些，所以他负的责任也比较重”^②。臧云远回忆1937年在武汉、长沙等地为民族革命大学招生的情况时说：有许多投考的救亡青年“说是喜欢文艺的，问他们‘读过谁的作品？’‘巴金’。‘你喜欢谁的作品？’‘巴金’。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可见巴金的《家》在当时是风靡一时，在青年心中，变成了反封建出走家庭，向往光明的艺术力量了”^③。无独有偶，荒煤在《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一文中也谈到，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招考文学系学生时，“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学，都说他们爱好文学，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④。著名的美籍华人作家董鼎山在晚年也回忆说：“巴金是我幼时思想发展上的第一个照明灯，第一个导师。”^⑤总之，巴金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但他的作品却促使不少青年为祖国的独

① 参见《“寻找理想”》，《巴金全集》第16卷。

② 转引自〔法〕明兴礼著，王继文译《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第68页，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5月版。

③ 《云集大武汉》，《南艺学报》1979年第2期。

④ 载1982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⑤ 董鼎山：《从何其芳著作的英译本谈起》，《读书》1979年第7期。

立、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许多青年却因读了他的书而奔向延安，奔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他并无意于成为青年的“导师”，但无数的青年却是在他的影响下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巴金一再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却又为读者提供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他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并且从不把文学创作视为不朽的人生功业。有人说巴金的魅力在于他的人格精神，也有人说巴金作品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但是，巴金的创作却不因为时过境迁而灰飞烟灭，他的“无技巧”的创作数十年来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巴金的《灭亡》先后印行 28 版次，《家》先后印行 33 版次。50 年代以来，《家》的印数又远远地超过了一百万册。甚至到现在，他的《灭亡》、《爱情的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以及《寒夜》等一系列作品，仍然在不断地被不同的出版社同时翻印出版。在三四十年代，巴金的创作曾“激动了万千读者的心”^①，“《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那个不晓”^②。50 年代中期，某女子中学的学生中“有 80% 以上的人看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或电影）”^③。60 年代初的上海图书馆，“巴金的小说是出借率最高的几种之一”^④。在八九十年代，巴金的小说仍然是青年工人和校园学生

① ② 巴人：《略论巴金的〈家〉三部曲》、王易庵：《巴金的〈家〉〈春〉〈秋〉及其它》，转引自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卷第 549 页、第 585 页，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9 月版。

③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第 12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版。

④ 陈丹晨：《巴金评传》第 309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版。

喜欢的作品^①。而在60年代初，“海外畅销的小说中，仍以巴金的创作居第一位”^②。巴金的创作穿越时空，显示了一种经久不衰的魅力。

巴金一生淡泊于名利，奋斗探索才是他毕生的追求。他只不过把对读者的奉献当作自己的职责，但却由此获得了人们的爱戴与尊敬。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他不仅是国内深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同时也获得了来自海外的种种荣誉与桂冠。1981年8月，巴金被第6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推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1982年，意大利有关方面授予巴金“但丁国际奖”；1983年，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巴金荣誉博士学位；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授予他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巴金“人民友谊勋章”，日本首届“福岡亚洲文化奖”授予巴金特别奖；1993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授予巴金“资深作家敬尉奖”，意大利蒙得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授予巴金和以巴金为主席的中国作家协会特别奖……。种种迹象无不表明，巴金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全世界。

由此可见，巴金已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巨人，研究巴金及其创作将成为一个永恒的学术话题。

① 参见黄瑞旭《关于当代青年工人文艺审美倾向的考察》（《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祝晓风等《大学生的文学阅读状况》（《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周立民《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青年读者》（《世纪的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

② 余思牧：《作家巴金》第172页，香港南国出版社1964年1月版。

二 巴金研究的历史考察

到目前为止，对巴金及其创作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三四十年代的巴金研究，五六十年代的巴金研究，以及八九十年代的巴金研究。

1929年4月，巴金的成名作《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完毕；9月，毛一波在《真善美》月刊上发表的《几部小说的介绍与批评》一文中就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价了《灭亡》这部小说。年底，刚果伦在《现代小说》上发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又介绍和评价了这部作品。而在同一年出版的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也注意到巴金及其创作。

此后，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不断有一些作家和文艺批评家论及巴金及其创作。据不完全统计，在这近20年中，各类书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巴金的介绍、评论、研究文章多达170余篇，其中有一些还是较有分量或较有水准的。如郾崇业对《死去的太阳》，谷非（胡风）对《海的梦》，老舍对《电》，王淑明对《萌芽》，《新生》，李健吾（刘西渭）对《爱情的三部曲》，《神·鬼·人》，以及巴人、徐中玉、王易庵等人对《激流三部曲》，李长之对《憩园》，康永年对《寒夜》的评论。而这期间，资深的新文学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也都对巴金及其创作有过引人注目的评价。

综观这时期有关的评价文章可以觉察到，对于巴金某一具体作品的评论文章占有较大的比重，有六七十篇，约占评价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综合地探讨巴金及其创作的文章为数甚少，较有分量的仅贺玉波的《巴金论》和吴复原的《巴金论》等几篇。可以说，这一时期讨论到巴金及其创作的文章大都带有书评的时

效性、随感性；而且，无论是对巴金创作的总体评价，还是对某一作品的具体批评，还大都带有鲜明的价值评判的特点，社会价值的评判也大大多于艺术价值的评判，就是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有关文字也不能例外。当然，本时期有关巴金及其创作的评价客观上反映了巴金文学创作在当时的价值与影响，这为日后的巴金研究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历史参照。

进入 50 年代，巴金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是法国的明兴礼著，王继文翻译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一书 1950 年出版。该书率先把对巴金的传记研究、创作研究以及巴金及其创作与社会的关系研究系统地纳入了学术探讨的视界。虽然该书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而论述也未必尽如人意，但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看来，它的学术意义还是值得充分肯定。除了其综合研究的特点外，该书摆脱了此前有关巴金创作批评中存在的那种新闻特点以及侧重于社会价值评判的思维模式，它已不是一般意义的随感性批评，而是一种冷静的、非功利的、带有一定理论意义的学术探讨。其中如对巴金创作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该书在进行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之后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不仅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对后来的研究者也颇有启迪。

而后，1953 年《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发行，1956 年电影《家》、《春》、《秋》在全国各地上演，伴随这而来的是评论界力图对巴金三四十年的创作进行一种新的历史性评判和艺术性解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当属冯雪峰的《关于巴金作品的问题》、扬风的《巴金论》以及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

冯雪峰的文章似乎是专为《中国青年报》的“答读者问”栏目而写的专稿，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代表着当时文艺界领导对于巴金创作的态度。而扬风、王瑶的论文均长达数万言，且分别刊载于《人民文学》和《文学研究》这两大刊物上，是这一时期有